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大国地位与 国际事务的话语权

——以中国争取制止侵华日军毒气战为例

周东华

摘要 抗日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对中国军民实施生化战。中国政府于1938年由中共首先尝试向世界呼吁，谴责侵华日军罪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在华盛顿和伦敦召开太平洋军事会议，协商太平洋地区战事。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参加两国两地会议。1942年5月10日丘吉尔发表制止德国对苏联施行毒气战的对德声明，只字未提中国，给蒋介石“四大国”之一的领袖身份认同以极大刺激，他通过宋子文转请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类似声明。待1942年6月5日罗斯福发表对日声明后，蒋介石进而谋求让顾维钧通过伦敦太平洋军事会议发表类似公开声明。1942年7月14日顾维钧成功提案，但因丘吉尔在大会上搁置讨论，令蒋介石的伦敦公开声明期望落空。1942年中国向盟国争取制止侵华日军生化战声明的一成一败，凸显的是抗战时期中国的地位和国家力量。中共和国民党向国际社会揭发与控诉日军毒气战的经验教训证明国家实力较弱方获取国际事务话语权的前提条件是“坚持抗战”而非“一味牺牲”或“退让”。

关键词 国民政府 中国共产党 毒气战声明 太平洋军事会议 国际事务话语权

作者周东华，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教授（浙江杭州311121）。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1)07-0202-15

浙江两位1940年宁波鼠疫防治当事人在几十年后回忆起当年这场鼠疫疫源时称，“疫源究竟从哪里来？不但在当时是一重疑案，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后，也还没有听到国民党政府正式宣布过，国际联盟也没有提出这一类的控诉。”^①在普通人或底层精英的视野中，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的生化战（主要是毒气战和细菌战），中国是无助的受害者，政府既没有向民众宣布日军如何推行生化战，也没有向国际社会控诉侵华日军罪行。对此，抗战时期担任国民政府宣传部长的王世杰在其日记中有所解释：“我方恐此种事实之发表足以动摇人心，故迄少露布。”^②“迄少露布”不等于没有“露布”。1941年前，中国政府也曾多次向全中国、向全世界揭露侵华日军毒气战罪行。待到1942年5月11日英国丘吉尔发表警告德国勿对苏联施用毒气战声明后，饱受侵华日军毒气战伤害的中国，积极主动向盟国谋求制止侵华日军勿施毒气战声明。学术界对此已有研究涉及。

① 孙金钤、倪维熊：《日本侵华战争中的罪行——宁波鼠疫的发生和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宁波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宁波文史资料》第二辑，宁波：政协宁波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4年，第178页。

②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1941年10月13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第382—383页。

1995年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等主编《侵华日军的毒气战》披露了中国对侵华日军毒气战揭露与指控的11则史料。^①1997年日本学者松村高夫《关于细菌战调查研究报告的回顾》一文称“中国当局确信日军实施了细菌战而最早向全世界发布的消息是，1942年3月31日的金宝善报告。”^②2004年另一位日本学者吉见义明利用美国国家档案馆新发现的档案史料，对1942年美国罗斯福发表警告日军使用毒气战声明的原委问题，作了深入探讨。^③2019年近藤昭二和王选编辑出版《日本生物武器作战调查资料》，收录了1941—1942年间国民政府向国际社会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以及美国获取的侵华日军细菌战档案史料。^④

上述研究成果很有启迪作用，但也可进一步补充。1942年3月31日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发表揭露日军毒气战声明的是宣传部长王世杰，金宝善的报告则是王世杰声明中最重要的医学专家调查报告。吉见义明的专题研究以及近藤昭二和王选的档案史料汇编，都聚焦于美国国家档案馆发现的美国有关侵华日军细菌战资料，对中国向盟国争取制止侵华日军生化战声明的来龙去脉、中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的“大国”地位与国际事务话语权以及争取行动背后的弱国外交问题，尚未能利用国民政府高层人物的日记、往来电文等档案史料展开论述。本文拟根据蒋介石、王世杰、陈布雷、顾维钧、宋子文等国民党高层的日记、往来电文等，结合中英文报刊资料，对这此问题作一专题探讨。

一、对自己抗战的前途看到更明确的远景：中共的揭发与控诉

1938年3月29日《新华日报》第二版刊登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一份通电，呼吁“全国各军将士、各报馆、各团体、国内外同胞及国际联盟、各国政府、各国民主政党、工会、各国红十字会、各国宗教团体及世界一切维护人道、爱好和平人士”联合起来，抗议日军毒气战暴行。电文首先列举了中央社徐州3月22日电文，说明日军因冀晋鲁地区游击战“频加失利，颇受重创”，“故决定加以报复”，企图“以飞机数十架”，向山西和陕北延安等地投掷“微菌弹”，“期整个消灭我各该地军队及参加作战之人民。”然后列明3月27日天津发来的确切情报，“日寇决以百架飞机向陕北数十县军民施放剧性伤寒病菌，以期杀尽此区域的数百万男女老幼生命”。

鉴于此，朱德等特代表八路军全体将士及晋省、陕北和晋冀鲁区域的“数千万民众”，“向我政府及全国同胞，海外侨胞，以及全世界无产阶级和民主组织，国际联盟和各国政府及一切民众团体呼吁，请求你们立即一方面发动全中国和全世界舆论，抗议和制止日本法西斯军阀拟定的施放毒气、毒菌杀害千百万生命的残酷兽行；另一方面，速即给敝军及晋省、陕北和晋冀鲁区域民众以防毒防疫的物资帮助。”在中共看来，日本法西斯对山西和陕北延安等地公然“施放毒气、毒菌”，是违反国际公法和人道主义的战争罪行，必须制止；另一方面也呼吁全国全世界援助八路军和山西等地民众“防毒防疫的物资”，以期保卫生命。

在这两项呼吁基础上，朱德进一步提出，“日寇”能在陕北和晋冀鲁区域“以此种非人手段屠杀敝军及千百万民众”，则“任何时候均可在全国任何地方出现”同样罪行；“日寇”能在中国施行“此等违反国际公法和起码人道精神的举动”，则“日寇及其他法西斯又何尝不可以同样残杀手段加之于其他任何国家的军民”，朱德建议，“立刻用一切有效方法抗议和制止日寇此种施放毒气、毒菌的罪行”。在朱德看来，这“不仅是敝军和晋省、陕北及晋冀鲁数千万男女老幼的迫切呼号和希望，而且是全中国同胞应该立即奋起进行的公共事情；不仅是有关四万万五千万全中国同胞生死的问题，而且是有关全世界人类命运的问题。”^⑤

应该说，朱德代表中共向全中国全世界发出的制止日军生化战的呼吁，有据有理，从陕北延安、山西等地方推及全国、由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的罪行推及其他法西斯在全世界的罪行，这是抗战时期中共最早向全中国、向全世界呼吁制止侵华日军生化战的声明，也是最早向全中国、向世界请求防毒防疫援助的声明。

①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侵华日军的毒气战》，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年，第3章。

② 解学诗、松村高夫等著：《战争与恶疫——日军对华细菌战》，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67—268页。

③ 吉见义明：《日本军队的毒气战与美国——美国国家档案馆资料调查》，步平译，《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1期。

④ 近藤昭二、王选主编：《日本生物武器作战调查资料》第1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03—227页。

⑤ 《敌将放毒菌屠杀我民众，朱德总司令通电呼吁全国全世界人民抗议敌暴行，以防毒防疫物质帮助晋陕军民》，《新华日报》1938年3月29日，第2版。

此后,中国共产党多次发表类似声明,揭露并制止侵华日军生化战企图。例如,9月22日刊登新闻称“华北各铁道公路沿线敌,不时遭我游击部队袭击,损失甚重。敌军行动不自由,恨我沿线民众助攻敌军,于各重要村镇饮水井内大量散放霍乱、伤寒等病菌,故华北月来,疾病流行,势颇猖獗,我民众染疫而亡者在8月份一个月中已达四五万人。敌军无耻,现反到处宣传系我方所为。此种荒谬绝伦之狡辩,我前方官兵及民众,莫不痛恨入骨。闻驻华北世界红十字会主持人,已对敌提出严厉之斥责。”^①这则新闻不但揭发了日军的生化战罪行,而且揭露了日军反咬一口的荒谬言论。10月11日朱德和彭德怀再次通电,揭露日军在豫北的生化战,“豫北敌以迭遭我袭击,伤亡惨重,乃在道清路两侧地区,烂施霍乱及疟疾病菌,民众罹毒者甚重,内黄、博爱等县尤剧,每村均有百数十人,惨绝寰宇,无复人性。”^②中共在1938年的这些揭露日军生化战的通电,产生了积极效果,据1942年7月21日《新华日报》社论,“远在抗战初期徐州会战之前,敌人就宣传过要对晋冀的游击队及延安投放毒弹,它的阴谋,当被朱彭总副司令揭露并通告全世界,一时未得售。”^③

在浙赣战役前后,中国共产党再次发表揭露侵华日军生化战罪行声明。1942年6月26日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通电“全国同胞,全世界人士”,揭露日军对河北省定县北坦村民众“施放毒气”,造成800余人被毒死的暴行,“为了维护世界公理、公法和正义,我们要求全世界所有的正义人士,用各种方法,对毁灭这些公理、公法、正义的日本法西斯盗匪,以有力的制裁!”^④7月21日《新华日报》社论指出,“敌人愈接近死亡,其行为也就愈疯狂残暴。在侵华五年战争中,它用了种种惨无人道的手段,来杀害我抗战军民,直欲灭绝中华民族的种族。而最毒辣的暴行,是施用国际公法所绝对不容许的毒气。自八一三淞沪之役以迄目前的浙赣战场、华北战场,日寇在较大战役中,都用过毒气、毒弹,甚至毒菌。”对此,中国共产党“谨代表华北一百万军民,和其他战区人民,向全世界控诉”。在此次控诉中,中共直接引用6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招待记者席上,特为日寇在中国战场施用毒气,所发表的‘以毒攻毒’的谴责的声明,要求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士对日寇予以有力的制裁!”和6月6日路透社华盛顿电“过去五年内,日军在中国战场施用毒气,不下千余次”电文,向“盟国及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士”呼吁关注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对于中国军民,尤其是身处敌后,既乏武器,又毫无防疫防毒设备的华北军民,予以物质上的援助!”^⑤

中国共产党通过通电、社论、报道等多种形式向全中国和全世界揭露侵华日军生化战罪行,其目的,一方面是揭露日军战争罪行,“政治部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大纲上,特别把‘揭露敌人的残暴,警戒预防敌人施用毒气、毒菌、毒药等违反国际公法与人道主义的暴行’列为今后加强努力的必要的任务之一”,^⑥另一方面,争取国际进步舆论支持,“在国际舆论上的一些反映”,“在促进国际形势的好转上是有着决定的作用;它能使‘不十分相信’的‘军事当局’‘颇为满意’,它能使一向对侵略者妥协求全的‘负责人士’觉到‘侵略集团的地位是在削弱,民主集团的地位为之增强’。我们再不怀疑到世界和平阵线‘并无实力’或竟‘并不存在’了。”^⑦再一方面,向世界和平力量募集抵御日军生化战资金或设备,“在国内外立即募集防毒基金、防毒器具(防毒面具、防毒雨衣等)和制造防毒器的材料等,首先供给前方将士的急需”。^⑧最后一方面,使自己冷静,清醒认识日军的侵略阴谋与应对路径,“因为这样可以

①《华北敌寇施放病菌》,《新华日报》1938年9月22日,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细菌战与毒气战》,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277—278页。

②《朱德彭德怀报告日寇在豫北地区烂施霍乱及疟疾病菌之罪行电》,1938年10月11日,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细菌战与毒气战》,第278页。

③《中国人民的控诉:揭露日寇在华北施毒罪行》,《新华日报》1942年7月21日,第2版。

④《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发表通电:控诉暴敌毒杀北坦同胞罪行》,《晋察冀日报》1942年6月26日,第1版。

⑤《中国人民的控诉:揭露日寇在华北施毒罪行》,《新华日报》1942年7月21日,第2版。

⑥孟庆树:《反对日寇放毒杀人》,《新华日报》1938年4月7日,第4版。

⑦《抗战新胜利对国际舆论的影响》,《新华日报》1938年4月12日,第1版。

⑧孟庆树:《反对日寇放毒杀人》,《新华日报》1938年4月7日,第4版。

帮助我们对自己抗战在国际形势上的作用，有更清晰的认识，对自己抗战的前途看到更明确的远景”。^①这与国民党的揭露和争取国际声援，有着根本区别。

二、这一惨无人道的行动本身必须受到谴责：王世杰的揭发尝试

相较于中共制止侵华日军生化战通电，国民党方面亦有所行动。1938年5月16日政治部部长陈诚招待驻武汉外国记者，就日军已经施用及准备大规模施用毒气战问题，向世界控诉。陈诚说：“单从4月5日起，敌人在中国各地使用了毒气七八次。例如4月5日敌人在台儿庄连续使用催泪瓦斯弹毒质手榴弹；4月19日宜兴、溧阳，敌人放射燃烧弹瓦斯弹，使我兵士多人中毒；5月6日，沿长江各镇，发现大批含有毒质的咸盐，查系敌人在芜湖盐仓投毒，再用兵舰运往沿江各镇，由汉奸兜售；5月3日，芜湖敌人在老山施放绿色毒气，我军中毒者多人，同日敌人又在台儿庄东北大官庄一带施放催泪瓦斯；5月4日，孙家埠敌人于巷战中施放催泪瓦斯，并使用达姆弹；5月5日，台儿庄东北泥沟，敌人被我军追击时，又使用催泪弹。”陈诚特别强调，“以上均系根据前线之确实报告”，“日寇”将这种“违反国际公法与人道主义的禽兽行为”“当做家常便饭”。

在揭露日军对华使用毒气战证据后，陈诚表明“关于敌人大规模使用毒气”一事，国民政府在5月13日“向国联行政院提出申诉”，控诉日本对中国采取的“大规模的化学战争”。陈诚说：“我们希望：（一）国联行政院接受中国政府的申请，明白痛斥日本进行化学战争的违法，并给予警告。假使日本再使用毒气，当即实施对日集体的制裁。（二）各国拥护国际公法及人道主义的政府，个别向日本提出警告，日本不得再使用毒瓦斯，否则一致拥护国联对日的制裁办法。（三）各国报章杂志，一致著论申斥日本使用毒瓦斯，造成全世界舆论对日本野蛮行为的大制裁。（四）各国广大民众，如慈善宗教团体、劳动团体等，以种种行动，如示威、集会、广播、讲演、传单等，痛斥日本的兽行，以全世界民众压倒的姿势，来阻止日寇在鲁南准备施行惨无人道之化学战争。（五）各国民众加紧抵制日货，加紧阻止军用及一切原料运往日本，加紧拒绝起卸日货，以唤起日本国内民众广泛的不满，以加速日本民众对日阀侵华战争的一般的反对。”^②陈诚的5条呼吁，现在看来过于理想化，且不论国联并无制裁日军的实力，即便是有实力发言的英美等国，也没有回应。

陈诚的呼吁虽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正面回应，但还是引起了在华国际友人的关注。例如，1938年7月12日在国际红十字会南昌分会工作的英国医师泰尔波（Dr. Talbot）“在南昌后方检验伤兵19名，从其种种病状判定其确系中毒致伤”，故他“提出详细书面报告，送呈我军事当局，此项报告现已送达国联”。^③8月22日一法国记者所亲睹日军袭击赤湖东岸阵地时“屡次使用大量毒气”，“该记者不但验得破绽弹壳，认为系窒息性毒弹，且取获种种证据，证明敌军其时在该处施放毒已达二星期之久”；8月30日，伦敦《泰晤士报》前线记者目睹日军“施放毒气”后发电披露“于《泰晤士报》”。^④

1940年浙江宁波、衢州和金华相继发生鼠疫，蒋介石命令行政院秘书处飭令卫生署调查浙江鼠疫问题，并在其日记中记录注意“倭寇施用毒瓦斯与其飞机散播病菌之宣传计划之准备”，^⑤但没有下文。

1941年9月28日—10月12日间，为配合第二次长沙会战，牵制日军，第六战区对宜昌发动反攻。10月9日第9师突击营反攻夺回东山寺等点，成功突入宜昌城内。日军第13师团为挽回颓势，违反国际公法，向中国军队施放毒气弹。^⑥10月11日，蒋介石日记称“昨日第九师攻入宜昌后，与敌巷战至午后未刻，敌机30余架在我阵地内投掷毒瓦斯炸弹，我入城之4营中，其一营长阵亡，此外三个营长皆受

①《抗战新胜利对国际舆论的影响》，《新华日报》1938年4月12日，第1版。

②《陈部长招待外国记者谈敌使毒气伪军反正》，《新华日报》1938年5月17日，第2版。

③ Japanese Charged with Using Gas, Chinese Report Sighted by British Doctor Filed,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August 11, 1938.

④《日军在各地使用毒气作战》，1938年9月7日，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细菌战与毒气战》，第325—326页。

⑤《蒋介石日记》，1940年12月30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下同，不再一一注明）。

⑥ False Chungking Claims to Recapture of Ichang Denounced by Spokesman, *The Shanghai Times*, October 15, 1941.

伤,其余死伤官兵皆中毒,鼻孔流血者为多。呜呼,敌军之野蛮残酷、穷凶极恶,可谓至矣。应即对外宣传,暴其违反公约、惨无人道之罪状也”。^①中国政府发言人在一个特别新闻发表会上说:“超过30架日机在昨日下午轰炸了宜昌城,投下了300多枚毒气弹。”^②王世杰称“我军之入宜昌城者,昨日午后被敌飞机数十架用毒气弹猛击,伤亡极重。据陈辞修自秭归来电话,谓中毒者口鼻流血,皮肤亦多糜烂。我军入城者计4营,营长4人,其一中毒死,其余三人亦均中毒”。^③

10月13日,蒋介石收到三斗坪吴奇伟关于日军施放毒气弹细节的电报,“查此次我攻宜昌部队中毒情形如次:(一)当我部队攻迫宜郊及入城时,敌即炮击毒气弹,并以飞机狂炸及投掷毒气弹,我官兵中毒极多,尤以攻占东山寺与胡家大坡据点之我官兵,全数中毒死亡。(二)中毒情形计分三种:(1)流涕泪,继而窒息。(2)鼻孔流血。(3)遍身糜烂起泡。”蒋介石在日记中称“据目前所查中毒而死者,有500余人,敌此种惨无人道行为,实为文明人类所不齿,我各部官兵更因此愤激,未稍有畏妥也,谨闻”。^④同月13日,王世杰表示:“我攻宜昌军自敌军使用毒气后,已放弃即时夺取城区之企图,现正布置抵御敌援军。予于今日午后晤见外国记者时,将敌军使用毒气之事实,郑重宣示。”按照王世杰说法,这是他第一次向“外国记者”揭发宜昌战役中日军施用毒气战事,并明确从淞沪会战开始,日军“仅用流泪性、喷嚏性之弹”,而到武汉会战时,“已逐渐使用窒息性及糜烂性之毒气炮弹或飞机弹”。^⑤王世杰10月13日向外国记者的揭发很快有了回应。10月27日中国军事发言人继续指控日军在宜昌战役中施用毒气战事,称“3000名中国士兵攻入宜昌城,其中25%死于日军的毒气弹,20%因毒气弹而受伤。两位从宜昌回到重庆的美国记者证实了这一点”。^⑥王世杰日记显示:“我军事发言人于今日继续发表宜昌战役中,敌军使用窒息性及糜烂性毒气之详情。美国记者二人曾赴宜昌附近观战,亦于今日新闻记者招待席上上述其目击事实。”^⑦

1941年11月湖南常德发生鼠疫,经过国民政府卫生署金宝善、容启荣和国联防疫专家伯力士等调查。到1942年3月23日,接获金宝善等报告的王世杰确信系日军“用飞机散播鼠疫菌,引起当地发生鼠疫”,他在日记中称:“予于今晨报告国防会议。此事在战争历史中当为一极严重之事。予正详细考虑如何发表,盖国内人心之浮动与敌人谗知其细菌战相当成功以后,或更受鼓励,均为吾人应行顾及之事也。”^⑧3月31日,王世杰正式向中外媒体揭露侵华日军在常德的鼠疫战。他说:“予于今日午后接见外籍记者席上,将日军在常德等地散播鼠疫菌之医士报告发表;并力主同盟国于战事总结时必须惩罚执行此种违反人道战术之日本军官。”^⑨

王世杰日记中并未收录他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这份声明,但在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一份题为《日军细菌弹引发鼠疫的医学证据报告》中收录了王世杰的这份声明。王世杰说:“现在回想一下,早在1940年10—11月间日军飞机袭击浙江鄞县、衢县和金华,散下大量被感染的麦粒,疑似日军采取的细菌战。但是因为当时这些地方缺乏足够的实验设备,我们的卫生署专家对日军这一犯罪并未下肯定结论。然而,通过最近对1941年11月4日常德鼠疫的调查,毫无疑问是日军的罪行。如同此前的案例一样,日军飞机于清晨在常德上空长时间盘旋,并未投弹,但散下诸多麦子和粟米。然而,不像之前的案例,常德红十字会实验室对敌机投下的谷物作了一个检测。”陈文贵医生、金宝善和伯力士在检验后都证实这是日军飞机投下的带有鼠疫跳蚤的谷物,“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非常严格而有效的措施去预防日军这种非人道犯罪。同时

①《蒋介石日记》,1941年10月11日。

② Chungking Claim, *The Shanghai Sunday Times*, October 12, 1941.

③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1941年10月11日,第382页。

④《民国三十年之蒋介石先生》,1941年10月13日,台北:“国立”政治大学人文中心,2016年,第750页。

⑤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1941年10月13日,第382—383页。

⑥ Chinese Spokesman On Alleged Use of Gas by Japanese,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October 28, 1941. also see Alleged Use of Gas by Japanese, *The North-China Herald*, November 5, 1941.

⑦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1941年10月27日,第386页。

⑧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1942年3月23日,第420页。

⑨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1942年3月31日,第422页。

强烈提请盟国注意日军的战争犯罪。我毫不怀疑日本将否认，就如同它曾否认过去的强奸暴行、虐待百姓、使用毒气和其他暴行一样。但我们坚信真相不容抹去”。^①

紧接着王世杰声明的是金宝善的《日军试图在华施行细菌战》，依次列举了1940年10月27日日军飞机在浙江宁波、10月4日在浙江衢县、11月28日在浙江金华、1941年11月4日在湖南常德等地施行的鼠疫战，称：“根据迄今搜集到的事实一览表，不能不得出日军在中国试行细菌战的结论。他们在浙江与湖南从空中散下细菌污染物，成功地引起鼠疫流行，对于受灾地区的普通民众来说是积极恐怖的，这一惨无人道的行动本身必须受到谴责。”^②

王世杰的声明和金宝善的报告，开始让国际社会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美国和英国虽然没有立即做出声援中国，发表谴责和制止日军施用生化战的声明，但至少这两国的情报部门已经收集了大量有关侵华日军生化战的情报，尤其是美国，这些情报被送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手中。1942年5月15日“为盟军承担一次巨大报复”^③的浙赣战役爆发，日军在战事失利时再次公然违背国际公法，悍然施用毒气战。受5月10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的制止德军对苏联实施毒气战声明刺激，蒋介石希望美国也能够仿效英国，对日本发表类似声明，这便是1942年6月5日罗斯福声明的出台。

三、以期同盟国或美国能作一种表示：争取罗斯福发表对日声明

1942年4月18日美国杜立特机队空袭日本东京，随后迫降浙江、江西境内。日军大本营随即更改原定作战计划，发动以“击溃浙江方面的中国军队，摧毁可被利用来打击日本本土的航空基地”^④为目的浙赣作战。4月30日，大本营发布“大陆指”第1139号，计划以地面部队攻占浙赣主要航空根据地，至条件许可时，彻底破坏一切军事设施。^⑤据此，日军第13军主力定于5月15日开始从杭州出发，进攻第三战区东部，摧毁浙江境内机场；第11军一部进攻第三战区西部，以策应第13军行动；同时命令第1飞行团空袭浙江各地机场。^⑥5月23日，日军出余杭，沿富春江以西地区侵扰，相继攻陷新登、桐庐两县，直逼建德洋溪，企图强渡新安江，以合围金华、兰溪。为尽快推进，日军使用毒气攻击。^⑦这是侵华日军在浙赣战役中施用生化战的开始。

蒋介石认为浙赣战役是中国为盟友美国袭击东京而承受的一次巨大损失，侵华日军在浙赣战役中施用生化战，美国有道义上的责任援助中国，制止日军再次施用生化战。5月28日，蒋介石预定“电美，斥责倭军对华用毒气之声明报复”。^⑧5月29日，蒋介石给宋子文电报：“敌军此次进攻浙东之建德与金华两地，皆施用毒瓦斯炮弹，在建德上空且施用飞机投掷毒弹，以致我军中毒伤亡者甚多。又自去年10月间，在宜昌施用糜烂性毒瓦斯，中外医生皆在我伤兵身上获得确切之证明，此次又在浙东施用毒气，若不由国际严斥与声援，恐其以后更放肆无忌。”蒋介石希望宋子文与美国政府“切商声援与斥责之道”，他特别指出：“例如上次英国首相相对德之斥责，若德对俄施用毒气，则英亦必还报之之意，且辞义必十分严正为盼。”^⑨宋子文回电：“奉艳电经转陈罗斯福总统后，今罗总统宣布日寇再在中国施用毒瓦斯，则美国必

① Dr. Wang Shih-chieh's Statement, in *Report Gives Medical Evidence of Bubonic Plague Caused by Japan's Bacterial Bombs*, March 31, 1942, in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R112, E295A, B11. 见近藤昭二、王选主编：《日本生物武器作战调查资料》第1册，第140页。

② P. Z. King, "Japanese Attempt at Bacterial Warfare in China," in *Report Gives Medical Evidence of Bubonic Plague Caused by Japan's Bacterial Bombs*, March 31, 1942, in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R112, E295A, B11. 见近藤昭二、王选主编：《日本生物武器作战调查资料》第1册，第141—143页。

③ 楼子芳、袁成毅：《浙赣战役：中国为盟军承受的一次巨大报复》，《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④ 《第13军袭来電綴（写）》，昭和17年4月，（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档案号：C12122329500。

⑤ 《命卷9—3部の内2号（2）》，昭和17年4月30日，第1380页，〔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档案号：C14060907400。

⑥ 《せ号作戦指導要領》，（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档案号：C14110790000。

⑦ 《浙赣战役经过概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787—10476。

⑧ 《蒋介石日记》，1942年5月28日。

⑨ 《蒋委员长自重庆致外交部长宋子文告以日军在我浙东施用毒气情形囑与美政府切商国际声援与斥责办法电》，1942年5月29日，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见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台北，1981年，第155页。亦见《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外交密档》第1卷，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年，第95页。

采同样步骤,以报复之等语。”^①

实际上,宋子文回电时,罗斯福并未发表对日声明,为什么宋子文电报回复罗斯福已经作了声明?吉见义明根据美国国家档案馆相关档案,对此作了回答。他在《日本军队的毒气战与美国》一文中称:6月1日,宋子文会见美国副国务卿威尔斯,在转交电报的同时,希望美国能仿效英国,对日军对华继续使用毒气战提出警告。威尔斯称只有罗斯福才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因此需要将电报呈交罗斯福。当天,威尔斯见到罗斯福,并得到罗斯福同意发表声明的指示。^②这便是宋子文回电称罗斯福宣布同意发表声明的电文由来。

6月3日,王世杰称他发电报给驻美大使胡适,“列举日军在华使用毒气情形”。^③6月4日,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馆收到王世杰发出的名为《日本在中国进行毒气战的报告》文件。同日,美国助理副国务卿伦古向罗斯福提出“关于使用毒气问题,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尚未发表任何正式的评论”,他认为日本很难接受如此“文明化”方式制止细菌战的警告,主张中国政府提供侵华日军毒气战和细菌战的详细战报和医学调查证据。^④

6月6日伦古希望中国政府递交的证据材料抵达美国国务院,而罗斯福却在前一天,即6月5日就发表了对日声明。罗斯福说:“本国政府接获真确报告,日军曾在中国各地使用毒气,或有损健康之瓦斯。余今特明确宣示,倘日本坚欲以此非人道之作战方式对付中国,或其他任何盟国,本国政府认为此项行动,无异对美而发,将采取同样办法,尽力报复,吾人将准备实施完全之报复,其责任应由日本负之。”^⑤

中国方面对罗斯福对日声明表示欢迎。《抗战周刊》称“敌人每每在各战场遭到我军猛烈阻击,无法进展之时,便不顾人道,不顾国际公法,残酷地使用毒气,如过去的宜昌战役,此次的浙赣会战,都于战事失利之时,使用毒气。罗斯福总统接获确实报告后,即公开发表声明,警告日本”。^⑥《湘潭县政府公报》刊文称“英揆丘吉尔前曾严厉警告纳粹,勿再施行毒气;美总统罗斯福现又严厉警告暴日,勿再采此下策,这充分表示英美坚强有力的态度”。^⑦

罗斯福之所以在正式接到中国方面递交的侵华日军生化战报告前一天即发表对日声明,吉见义明认为早在1941年11月宜昌战役后美国陆军部就已经开展对侵华日军生化战情报的收集,并将之呈送罗斯福审阅。^⑧吉见义明在论文中仅提供了一份1941年11月美国搜集的侵华日军生化战情报及被珍珠港事变中断的政府应对。显然,他的判断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充足。实际上,1942年4—5月间,美国政府从多个渠道得到了侵华日军施行生化战情报。

例如,4月6日,国民政府卫生署向美国医疗援华署递交了一份题为《流行病报告第1号:鼠疫流行情况》的报告,正式向美方介绍了湖南和浙江两省因日军散毒而爆发的鼠疫概况,以及福建和广东两省的鼠疫情况。^⑨4月7日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收到外交部6日电报,称“国民政府卫生署长金宝善声明:由中外医疗专家递交的报告显示侵华日军至少5次对中国实施细菌战试验”,并概述了侵华日军在宁波、衢

①《民国三十一年之蒋介石先生》(上),1942年5月28日,第517页。

②吉见义明:《日本军队的毒气战与美国——美国国家档案馆资料调查》,步平译,第101—101页。

③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1942年6月3日,第435页。

④吉见义明:《日本军队的毒气战与美国——美国国家档案馆资料调查》,步平译,第101页。

⑤《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华盛顿宣示倘日军再在中国施用毒气则美国必采同样方法尽力报复声明》(译文)。1942年6月5日,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见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156页。步平先生从英文回译的罗斯福声明如下:“美国政府已经得到了确凿的情报,证实日本军队在中国的许多地方使用了毒气(poisonous gas)和有害的气体(noxious gas)。如果日本继续对中国或其他盟国使用这一非人道的战争手段(inhuman form of warfare),我国政府将视其为对美国的战争行为,因此将毫不犹豫地使用同样的手段给予最大规模的报复。我想对此是毫无疑问和明白无误的。现在正在进行报复的准备,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应由日本方面承担。”参见吉见义明:《日本军队的毒气战与美国——美国国家档案馆资料调查》,步平译,第101—102页。

⑥《罗斯福警告敌用毒气》,《抗战周刊》(广东梅县)1942年第8期。

⑦《罗斯福警告暴日勿再用毒气》,《湘潭县政府公报》1942年第38期。

⑧吉见义明:《日本军队的毒气战与美国——美国国家档案馆资料调查》,步平译,第101页。

⑨Epidemiological Report No. 1, presented to the 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id to China, Received April 6, 1942, by National Health Administration, China, January 24, 1942. 见近藤昭二、王选主编:《日本生物武器作战调查资料》第1册,第145—146页。

州、金华、常德和绥远实施细菌战情形。^①4月16日，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J. Edgar Hoover）将《费城纪事》（The Philadelphia Record）上刊登的一份题为《日本发动细菌战，这也许是他们避免被美国打败的最后一张王牌》的剪报转呈美国陆军部军事情报局主官，该剪报援引侵华日军在常德施行的鼠疫战史实。^②5月1日，驻重庆美国大使馆武官助理包瑞德（David D. Barrett）向美国陆军部军事情报局主官递交了两份《新华日报》刊登的侵华日军企图在冀晋察地区和太行山区制造鼠疫的报道。^③5月5日，驻重庆美国大使馆官员高斯（C.E. Gauss）向美国国务卿递交国统区鼠疫流行情报简报，称湖南常德鼠疫系由侵华日军细菌战引发。^④

因此，当1942年5月15日浙赣战役爆发，蒋介石于5月29日请宋子文转告罗斯福，希望罗斯福能够发表警告日军勿施生化战声明时，罗斯福由于在1942年4—5月诸多类似上述情报，对侵华日军生化战均有相当了解，故他痛快地答应了宋子文转述的蒋介石请求，于6月5日正式发表对日声明。当然，这也可以视为罗斯福完成了1941年12月因珍珠港事件而中断的美国声明。

1942年6月5日罗斯福按蒋介石愿望发表对日声明，警告侵华日军勿再施用生化战后，蒋介石认为中国在国际舞台已经重拾尊严。按照蒋介石期许“同盟国或美国能作一种表示”设想，美国总统罗斯福声明发表后，同为盟国的英国，也应该公开发表同样声明。但是，英国首相丘吉尔先于罗斯福发表对日宣言前，即5月10日已经发表制止德军对苏联毒气战声明，而在丘吉尔这一对德声明中，只字未提中国。对此，蒋介石激恼愤怒，一度考虑退出伦敦太平洋会议，召回驻英大使顾维钧，以维护大国脸面。待到罗斯福对日声明发表后，蒋介石着力改善中英关系，敦促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在伦敦太平洋军事会议上向大会提案，请求公开发表制止侵华日军生化战声明。

四、对美英之政策所以不能不克己自反：蒋介石的反省

1942年3月7日，丘吉尔在给罗斯福的信中说：“一切都预示着，德国将在春季大举向俄国进攻，而我们对于同德军激战的唯一国家又无力相助。”^⑤在这封信中，丘吉尔已经在思考如何给予苏联实质性的援助，那怕只是道义援助。于是，英苏关系出现了一段较为亲善的时期，丘吉尔在回忆录中称，“由于普遍希望在德国即将发动的攻势中设法给苏军以援助，而且，由于担心德国会对他们使用毒气，可能是芥子气，我已征得内阁的同意，准备发表公开声明：如果德国人对俄国使用毒气，我们也将用毒气攻击德国，作为报复。”^⑥3月20日，丘吉尔致电斯大林，“经与我的同僚和三军参谋长商讨之后，我愿向你保证：英王陛下政府将对俄国使用毒气武器一事，看做如同对我们自身使用的一样。”丘吉尔向斯大林保证，“在苏联军队和人民一遭到此种进攻时，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德国西部的一切适当目标使用此种毒气弹。”但是，丘吉尔也提出“适当时机提出公开警告”，至少“目前并不急迫”，丘吉尔认为英国需要“有充分的时间，使我国的防毒气的各种预防措施，准备完善”。^⑦3月30日斯大林回复丘吉尔：“我愿向你表示，苏联政府对于英国政府保证把德国人对苏联使用毒气一事看作如同对英国使用这种武器一样，（而且）英国空军将立即对德国适当的目标使用英国所储存的大量毒气弹，十分感激。”^⑧斯大林接受了

① telegram from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Chungking to Chinese Embassy, Washington, April 7, 1942, in 藤昭二、王选主编：《日本生物武器作战调查资料》第1册，第148页。

② Japs Try Out Germ War; May' be Their Ace in Hole to Avert Defeat by U. S., 见近藤昭二、王选主编：《日本生物武器作战调查资料》第1册，第154—158页。

③ Japanese Attempts to Create Plague in North China, April 25, 1942, in 见近藤昭二、王选主编：《日本生物武器作战调查资料》第1册，第161—162页。

④ Transmission of Report Concerning Plague Situation in Unoccupied China, 5 may, 1942, 见近藤昭二、王选主编：《日本生物武器作战调查资料》第1册，第175—178页。

⑤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1942年3月7日，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命运的关键》，北京编译社译，海口：南方出版社，2007年，第294页。

⑥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命运的关键》，第295页。

⑦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1942年3月20日，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命运的关键》，第295页。

⑧ 斯大林总理致首相，1942年3月30日，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命运的关键》，第296页。

丘吉尔递出的善意。

5月10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警告德国勿对苏联采取毒气战声明。王世杰在日记中记录:“丘吉尔首先发表广播演说,警告德国,谓德如对苏使用毒气,英必对德使用毒气。”丘吉尔的这份对德声明,极大地刺激了国民政府高层。王世杰说:“演词中对苏对美,备极称扬,但无一字言及中国。显然系对中国方面近来批评英国之言辞表示不满。中英邦交显已伏有暗礁。予甚忧闷。”^①陈布雷也认为“战氛日恶,而英相昨日演词竟未提中国只字,远东抗战之局殊可忧也”。^②

相比王世杰和陈布雷,蒋介石对丘吉尔对德声明只字不提中国事更为恼火。蒋介石认为“丘吉尔十日演说,对战局独重俄国,兼带美国,而对于我国只字未提,缅甸之败,我军被欺受诈为其牺牲,而且仍在缅甸被围,未脱险境,彼不仅不加救援,而亦未提我援缅之贡献,于情于理皆无,此种恶劣之态度,可憎已极。古人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吾今更觉英尤之不可共事也。”^③恼羞成怒之下蒋介石甚至有了让顾维钧停止出席伦敦太平洋军事会议的打算。王世杰说他上午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有关丘吉尔对德声明的看法,下午前往蒋介石住宅汇报他对中英关系的看法,感觉到蒋介石“对丘吉尔态度甚愤慨,且拟命令顾少川停止出席伦敦太平洋会议”,王世杰“力陈不可”。在王世杰看来,首先,“英美联合不会分裂,我不能弃英而亲美”;其次,在未来和会中,“我国利益与苏联冲突之可能甚大”,与英国冲突之处不多,如果中国与英国不妥协,那么“在未来和会中,我势力甚孤,不易应付苏联”。蒋介石“未能反驳吾语”。^④

5月12日王世杰的劝说并未能打消蒋介石的愤怒。蒋介石在13日日记中记载,“自昨晨至今,为丘吉尔演说愤激不平者,几乎有26小时之久,至午刻此心渐平,愤怒渐解。”^⑤陈布雷于13日早晨8点10分起床后不久便被蒋介石约去谈话。陈布雷发现蒋介石“对英国愤慨极深”,“口授要旨”,命令陈布雷“拟致宋转告罗总统电”并“拟令我方在伦敦太平洋作战会议停止出席,或将召回驻英顾大使,可于电中言之”。陈布雷“回寓后仔细考量”,觉得“甚难着笔”。中午11点王世杰来访,“详谈一小时,力言此电最好不发”。^⑥王世杰说:“今晨晤布雷,据云蒋先生拟电罗斯福,告以中国拟令顾大使维钧停止出席伦敦太平洋会议并拟召其回国。予谓布雷,此事务婉陈劝止,必要时予愿约亮畴面向蒋先生陈述。布雷谓彼将签呈意见。”^⑦陈布雷经与王世杰详谈后下定决心,起草电报、撰写签呈。他说:“雪艇去后,先将电稿写成,自行誊缮,又另作签呈一件,说明此举甚少积极之作用,转多消极方面之弊害,请委员长再加考虑。”^⑧陈布雷到下午3点才完成这两样工作。

对于王世杰和陈布雷的劝谏,13日下午气消一半的蒋介石有所考虑,其日记称:“及至午后看伊川学案,至‘良其背,不获其身’一节,更觉我与忘我意义之重要,则此心甚觉宽大舒畅,较之战胜敌国为快,乃知克己自反之学,必须从宽缓与忍耐始也。布雷为余草罗斯福函后,亦详函劝解,获益非鲜也。”^⑨

丘吉尔的对德宣言是导火索,将蒋介石积累的缅甸战事失利、英国以欧洲战场为先、忽略中国大国地位等因素聚焦引发,驻英大使顾维钧称“英国人坚决主张将盟国军事力量集中投在欧洲战场上,这种主张最后赢得了美国的同意。这就在中英关系上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⑩5月16日,蒋介石在上星期反省录中记录,“傅秉常对英使说话太无技巧,并言政府与人民皆对英愤激之语,英政府得此报告,自必恼羞成怒,对我负气矣。然英人能负气,而使之无法欺伪,未始无益耳。英国对我外交方针与感情,已恶极

①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1942年5月11日,第430页。

② 《陈布雷从政日记》(一九四二),1942年5月12日,香港:开源书局,2019年,第81页。

③ 《蒋介石日记》,1942年5月12日。

④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1942年5月12日,第430页。

⑤ 《蒋介石日记》,1942年5月13日。

⑥ 《陈布雷从政日记》(一九四二),1942年5月13日,第82页。

⑦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1942年5月13日,第431页。

⑧ 《陈布雷从政日记》(一九四二),1942年5月13日,第82页。

⑨ 《蒋介石日记》,1942年5月13日。

⑩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1页。

矣，应特注意。”^①

1942年5月在伦敦的驻英大使顾维钧受困于紧张的中英关系。他说：“尽管美国，尤其是罗斯福总统出力帮助中国，给中国送去数量有限的作战物资，并派美国空军飞中国运送军需品。这些只不过是聊胜于无的措施，从中国人的观点看，它根本满足不了中国战场的全部需要。”英国政府的欧洲优先导致了中国政府“极大的失望和不满”，顾维钧认为“这种情绪特别是针对着英国对亚洲战争所采取的政策和态度”。^②为改善不断恶化的中英关系，5月30日顾维钧和艾登进行了非正式会晤，艾登说将安排顾维钧与丘吉尔见面。同日，接到宋子文关于罗斯福同意发表对日声明的电报后，蒋介石心情转好，开始重新思考中英关系。当天日记称“下午回渝寓，看学案，会英人”，预定“太平洋大宪章之研讨”。^③5月31日在本月反省录中称：“幸而今日中国尚有一片土地与相当兵力，以图自存，而未为帝国主义者完全牺牲耳。”^④

6月3日，顾维钧与丘吉尔会晤，“我感到首相对最近一些不愉快的事态发展全都知道，他显得有些严峻，不像平时那样亲切。考虑到我所听到的重庆方面的情况，对他这种神情我并不感到奇怪”。^⑤在顾维钧来，会面当日丘吉尔显得不高兴的原因很多，“不过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中英两国政府间关系的不断恶化”。^⑥为此，顾维钧尝试说服丘吉尔改善中英关系。

6月4日，蒋介石“考虑时局曰：‘（一）英国要求协商收复缅甸之计划，近来似已觉悟以前对华态度之不当矣。’”^⑦表明蒋介石十分关注中英关系的改善问题。6月6日顾维钧在电报中详细交代了与丘吉尔会谈事，“英首相丘吉尔约往长谈，钧表示我方对缅战至为失望。现日本集结兵力四面攻华，益使民众感觉缅战结果影响中国，战事甚巨，极望英军设法改善局面”，随后，顾维钧总结会谈4点成效：第一，英国认为中国战区十分重要，“并未轻视”，“英方决定一俟数月后准备完成，即反攻日本”；第二，对于有效援助中国的办法，“正在进行”，“英于败德后，决定继续攻日至日战败为止”；第三，英国将在财政上“继续助华”；第四，英国希望中国对于英国的印度政策以及在远东的作战用意，“万勿误会”。^⑧顾维钧在电报中提及丘吉尔希望与蒋介石协商缅甸战事，蒋介石表示同意，但协商的时间需再行商定，他在当日回电中称“关于协商缅甸军事一节甚赞成，但我军在缅甸迄今尚未收容与集中完毕，不知伤亡缺额数，须待集中整顿以后，再定协商时期为宜。”^⑨从6月4日和6日这两天日记可知，对蒋介石而言，横亘于中英关系的关键问题是缅甸战事，但凡英国在缅甸战事上有所反思、有所行动、有所让步，他均愿意顺势而为，推动中英关系改善。

由于英国在缅甸战事问题上犹豫不前，中英两方虽然有改善彼此关系的愿望和行动，但效果不佳。到6月中旬，顾维钧观察到“两国关系仍在不断恶化”，^⑩“到了夏天”，顾维钧甚至接到蒋介石密电，指示他“再不要向英国人提贷款的事，也不要向他们乞求任何援助”。^⑪在顾维钧看来，导致中英关系改善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是缅甸战事迟疑不决、中英贷款迟迟未能敲定、英苏同盟条约和中国大国地位的确认问题。而这一时期英国与苏联签订的英苏同盟条约，再次刺激到蒋介石的精神，猜忌、多疑、敏感的蒋介石和欧洲优越、英美优秀、帝国优先的丘吉尔共同使中英关系再度紧张。

早在6月5日日记中，蒋介石对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访问美国事犯酸，认为罗斯福向苏联表明中国“四大国之一”地位，但苏联对此熟视无睹，联想到英苏同盟条约，蒋介石又表示焦虑。他说：“俄外长

①《蒋介石日记》，1942年5月16日。

②《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61—62页。

③《蒋介石日记》，1942年5月30日。

④《蒋介石日记》，1942年5月31日。

⑤《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62页。

⑥《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65页。

⑦《民国三十一年之蒋介石先生》（上），1942年6月4日，第545页。

⑧《民国三十一年之蒋介石先生》（上），1942年6月6日，第549页。

⑨《民国三十一年之蒋介石先生》（上），1942年6月6日，第548页。

⑩《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69页。

⑪《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66页。

莫洛托夫到美国,仅秘密留驻二日即回俄,罗斯福总统对其提及中、美、英、俄共同维持和平,解除轴心武装之意,而彼似无甚表示,而其对中国,更视若无睹矣。英、俄乃订立战时与战后廿五年同盟协定,其主旨在维持欧洲局势,更与我华无关矣。”为表示中国系主权独立的“四大国”之一,蒋介石扣留了苏联飞机,他说:“俄飞机最近又深入我国甘肃机场,而事前并未得我国同意,其侵犯主权不一而足,余严令扣留,依法办理,可恶极矣。”^①6月1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再次就英国外相伊藤就英苏同盟及大国地位演说表示不满:“英国外相伊藤在俄、英同盟协定成立时演说,以世界人类各民族生命之前途,皆决之于美、俄、英三国之合作,而视中国与其他各国为无物。”蒋介石称英国这种行径是“英帝国主义侵略之阴谋”,是英国“自私自利,拨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之劣性”。他强调,“若非美国主持公道者,参加此次同盟联合在内,则中国实羞与为伍矣”,并在内心批评英国“若再任其称霸世界,则人类将无将来矣”。^②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提到蒋介石“对英国在印度问题上的政策已感不满,此时又发现英国人对贷款的态度如此令人失望,甚至有时使人生气”。^③

6月17日,顾维钧应约拜访艾登,“主要议题是如何改善两国关系和消除误解,这是我们双方都认为很重要的问题”。^④王世杰在6月19日日记中记载:“近日我政府与英、苏之感情均不甚融洽。英方力思纠正此种情形,但蒋先生与丘吉尔之间久无文电往来,显然有隔阂存在。”王世杰认为英国对华五千万英镑借款迄未商定条款;苏联迄未允许提供足够汽油,始终未允许对中国提议借道波斯湾运送美国来华物资之提议;中国政府在兰州扣留秘密运物至延安的苏联之飞机,“凡此种种,均为有害之暗潮。”^⑤因此,王世杰希望国民政府有人可以居中斡旋,解决政府面临的外交困境。太平洋军事会议期间丘吉尔、罗斯福等表态,令蒋介石看到美英与苏联究竟不同,英国承诺出兵缅甸、承认中国战场的地位,承认中国的“四大国”地位,成为中英关系缓和的着力点。

6月21日蒋介石电宋子文,“探询美国是否参加英俄同盟之意,并标明我中国之态度”,甚至提出“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决策。他说:“此次丘吉尔到美所商者必有重大问题,决非仅为开辟第二战场等事也,请兄切实探询。如其有请美国加英俄同盟关系,则我国应在相当时机,可向美表示态度,委婉说明中国对国际政策,无论军事、政治皆惟美国之马首是瞻,凡美国不参加之事,则中国亦不愿单独参加,如美国参加之事,则中国亦必须共同参加。”蒋介石进而提出,“吾人深信美国对我之政策亦必如是也。而且太平洋上始终有密切利害关系之国家,莫过于我中美两国,即使无英俄同盟之事,而我两国为现在与将来永久共同利害计,我中美两国似比英俄更有进一步缔结同盟之必要。请以此意转达罗斯福总统为要。”^⑥在强硬的英国面前无力的蒋介石,只能将希望寄托于罗斯福身上。

从6月28日日记开始,蒋介石对英国的态度虽有改观,但仍将英国视为“企图统制中国者”“无信义国家”。蒋介石6月28日日记,“预定,电宋,顾,督促英国,照邱在美国太平洋会议中所言者,如期攻缅。”蒋介石特别记录,“注意,俄、倭、英三国皆无信义,而企图统制中国者也,然而英国之行动,未如其他二国之显著也。”^⑦在6月30日本月反省录中,蒋介石称“俄莫洛托夫分访英美,订立英俄25年同盟,此于中国未始无益,观英美对俄所表示者,每提中国为盟国四强之一而不肯遗忘,此或使俄不快与不安,或使俄对华态度与政策,有所变更乎。”中国系“盟国四强之一”的提法让蒋介石深陷其中,他主张以“忍”字诀发展与英美外交关系:“我国对美英之政策所以不能不克己自反,切毋以小不忍而乱大谋。”^⑧

①《蒋介石日记》,1942年6月5日。

②《蒋介石日记》,1942年6月15日。

③《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66页。

④《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65—66页。

⑤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1942年6月19日,第438—439页。

⑥《民国三十一年之蒋介石先生》(上),1942年6月21日,第599页。

⑦ 蒋介石日记,1942年6月28日。

⑧ 蒋介石日记,1942年6月30日。

五、惟宣言一层，英方不无困难：丘吉尔的态度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倡议召开太平洋军事会议，邀请太平洋地区的盟国共同与会研讨战争局势。会议地点一般放在华盛顿白宫进行，有时也在英国伦敦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官邸举行。虽然罗斯福强调无论是伦敦太平洋军事会议还是华盛顿太平洋军事会议，“均属咨询团体”，“各在本京咨商而又相互咨商”^①，但从会议召集和会议地点可知，美国和英国是太平洋军事会议的绝对主导。中国作为盟国在东亚抵抗日军侵略的主力军，以“四大国”^②之一的身份在华盛顿和伦敦两地都参加该会议。

1942年5月7日，罗斯福在给蒋介石电文中称“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太平洋作战会议，所有太平洋沿岸的国家均可参加。它的成员负有研究政治—战略问题，并对它们获得共同协议的任务。在一些比较专门的问题上，有关国家的代表，无论它是来自中国、澳大利亚、荷属东印度或是新西兰，将和参谋们一起会商，提出他们自己的意见，并参与决议的形成。美国参谋长使我确信，有关你的杰出的国家从事这场战争的任何事情，都不会不与你的尊贵的代表协商而进行，他将获得充分的机会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合作。”罗斯福进一步保证，“宋子文博士能成为太平洋作战会议的战员，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深深地感激他给予我们的巨大帮助和他经常不断奉献的建议和情报。我毫无保留地向你保证，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唯一目标是击败敌人，它将确使我们两国人民得到一个公正的和平。”^③按罗斯福承诺，中国的诉求可以在太平洋军事会议上得到充分的、平等的机会予以实现。对蒋介石而言，1942年6月5日罗斯福对日声明发表后，蒋介石希望在伦敦举行的太平洋军事会议上顾维钧能够敦促会议发表类似罗斯福对日声明的公开宣言，以弥补1942年5月10日丘吉尔对德声明中只字不提中国的尴尬，以匹配中国“四大国”之一的地位。

在罗斯福对日声明发表前两天，日本东京方面发表消息称“中国军方一位高官在新闻发布会上断言日军在金华和兰溪使用了毒气战”一事“系中国政府一贯的谎言”，断然否认对华施用了毒气战。^④颠倒黑白，倒打一耙是日本使用的惯用伎俩，催促中国赶紧向世界呼吁认清并谴责侵华日军生化战罪行。

6月12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乞饬各机关发言人对于宣传敌使用毒气万分慎重注意”，对侵华日军毒气战和细菌战的事实报道要精准。他说：“九日渝发言人称，敌用毒气八百次云。一般人多以为此类情报不近情理。”宋子文强调罗斯福对侵华日军施用毒气“已经切实严厉警告”，之后如果日军“再用毒气”，中国方面“最好证据确实”，“或使友邦军官目睹死伤惨状”，唯如此，“始足以激发友邦公愤，或实行报复手段”；如若不然，“则反足使警告失其效力”。^⑤6月17日，宋子文再次致电蒋介石，就华盛顿太平洋军事会议上罗斯福关于毒气战问题的两点表态作了汇报。第一，罗斯福称“德意对英美警告勿用毒气宣言，实为准备自己开始用毒气，故我联盟国对于敌施用毒气宣传最好谨慎”；第二，侵华日军“确对中国军队施用毒气。例如，在缅甸中国某师进攻时敌佯退而施用砒（砒）霜毒气，致中国军队有损失”。^⑥同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英国外交部“举行非正式会议，就一般问题交换意见，并就有关各国作战努力之问题，提出讨论。”^⑦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应邀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会面，双方讨论了贷款问题、从空中支援中国军队问题和以及荷兰飞机由印度尼西亚飞抵印度供中国使用问题，其中特别谈到“日本人使用毒气的报道”。^⑧在这次会谈中，顾维钧可能已经向艾登提议将在伦敦太平洋军事会上作有关制

①《华府太平洋战事会议昨举行第一次会，会议性质重在咨询》，《新闻报》1942年4月2日，第2版。

② 王建朗：《大国意识与大国作为——抗战后期的中国国际角色定位与外交努力》，《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

③ 罗斯福致蒋介石电（底稿），1942年5月7日，华盛顿。见王建朗选编：《抗日战争时期中美军事关系资料》（续二），《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④ Poison Gas Use Refuted by Japanese, *The Shanghai times*, June 4, 1942.

⑤《宋子文致蒋介石请饬各机关对于宣传敌施用毒气慎重注意电》，1942年6月2日，吴景平、郭岱君编：《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1940—1943）》，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3页。

⑥《宋子文致蒋介石报告本日太平洋会议情形电》，1942年6月17日，《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1940—1943）》，第167页。

⑦《太平洋战会议曾讨论中国情形》，《中央日报》（扫荡版）1942年6月19日，第2版。

⑧《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65—66页。

止侵华日军生化战提案。

对于宋子文在太平洋军事会议上的提议和罗斯福、丘吉尔等表态,蒋介石都认为是“敷衍之词”,是“空言搪塞”。他在6月24日日记中写道:“注意,一、罗、邱与子文会谈,仍为敷衍之词,对远东战局并未有何改观。”^①在6月27日日记中称:“接子文太平洋会议情形报告,皆空言搪塞,毫无结果,此乃在意料之中,无足为奇。”^②蒋介石期望顾维钧在伦敦太平洋军事会议上有所收获。

早在6月3日,王世杰在给驻美大使胡适发电报提供侵华日军生化战资料的同时,也给驻英大使顾维钧和外交部长宋子文发电报,提供日军在华施用生化战证据,并告之蒋介石希望他们能够在太平洋军事会议上举出,“以期同盟国或美国能作一种表示”。^③在美国,收到王世杰电报的胡适将资料转呈美国国务院,宋子文则在6月中旬华盛顿太平洋军事会上提出制止侵华日军施用生化战提案,而罗斯福则于6月5日就发表了警告日军勿对华施用毒气战的声明。在英国,整个6月份顾维钧都没有机会在伦敦太平洋军事会议上提案,直到7月14日他才正式在会上提出制止侵华日军生化战提案。

7月14日下午,伦敦太平洋军事会议召开。丘吉尔首先在会上报告他与罗斯福商定的远东战局情形,第一,日军集中军力侵占中国,在英美“预料”之中,英“对我表述同情”。丘吉尔说:“如在埃及英能胜德,苏联能支持至秋末,则年内将会同美方恢复缅甸及印华交通,现已在准备。”第二,丘吉尔认为如果“苏联战事不利,日必攻苏”,果如此,“则远东战事形势不同,可另开新局面”,“英美等将四面攻日,俾减少苏华之痛苦”。顾维钧随即咨询:“援助我国空军之议有何进展?”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回答,“尊重美之意见,英队留即由美另调美队赴华”。顾维钧最后提问,“我前提之日对华施用毒气与微菌战案,今日讨论”,他特别“要求参照最近美总统对日及邱相对德之宣言,由会对日作同样表示,使敌有所警惕,对我不敢再施用,并致联盟之致”。^④

顾维钧所谓“前提之日对华施用毒气与微菌战案”,是指他7月3日递交会议讨论的提案和两份附件,顾维钧说:“根据蒋介石指示,我很荣幸呈上两份声明,一份涉及侵华日军施用毒气战,另一份涉及过去2年内侵华日军施用细菌战试验。我提请参加太平洋军事会议的成员们关注这些公然践踏国际法和公然违反日本政府自身也同意的国际公约的非人道方式。”^⑤7月13日,顾维钧的提案和两份附件由会议秘书处复制11份,分发给英国首相丘吉尔、英国内政大臣、英国外交大臣、荷兰首相、顾维钧、印度和缅甸秘书长等11人。^⑥

在第一份附件《侵华日军毒气战》中首先列举了1942年浙赣战役中日军最近施用的3次毒气战,包括5月26日在建德日军企图渡过新安江时对中国军队施用了毒气战,造成1/3中国士兵受伤或死亡,被迫于第二天凌晨撤出阵地。第二次发生在金华,第三次于5月29日发生在兰溪。随后,该文件统计了截止1941年6月底侵华日军一共施用876次毒气战,这些毒气可分为6类,其中3类属于刺激性毒气,另3类属于有毒毒气,危害性也逐年提升。抗战爆发后日军对华第一次毒气攻击发生于1937年淞沪会战,当时仅施用了催泪瓦斯等刺激性毒气。在1938年台儿庄大捷后,日军运送更多的化学武器到中国,在武汉会战中多次施用毒气。1938年10月后采用窒息性毒气,1939年7月在晋南用飞机投掷毒气弹。在介绍完宜昌战役中日军毒气战及中国军民伤亡情况后,该文件列举了中国各战区捕获的日军毒气战“极密文件”,最后列举了最近6次侵华日军在浙江和河南的毒气战。^⑦

①《蒋介石日记》,1942年6月24日。

②《蒋介石日记》,1942年6月27日。

③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1942年6月3日,第435页。

④顾维钧致蒋介石电报,1942年7月14日,原件藏哥伦比亚大学手稿与珍本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扫描件,“顾维钧档案”,档案号:K00-0054-007a-0034。本文所使用之“顾维钧档案”得到侯中军研究员协助,下文不再一一注明。

⑤A Letter Dated 3rd July 1942 from Chinese Ambassador,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扫描件,“顾维钧档案”。

⑥Copies of This Notices have been sent to --, 13th July, 1942, in P. W. C. (42) 12th Meeting.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扫描件,“顾维钧档案”。

⑦Annex I-Japanese Gas Warfare in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扫描件,“顾维钧档案”。

在第二份附件《侵华日军细菌战试验》中详细列明有中外医疗专家证实的过去两年中侵华日军的细菌战，分别是：1940年10月4日在浙江衢县（今浙江衢州主城区）日军飞机空投染有鼠疫病菌的小麦等引起当地鼠疫；1940年10月27日日军飞机在鄞县（今浙江宁波主城区）上空散下大量麦子和粟米，于10月29日引发第一例鼠疫；1940年11月28日在浙江金华投下大量跳蚤，经当地医院检验，系鼠疫跳蚤，随后引起当地鼠疫；1941年11月4日在湖南常德日军飞机低空投下纸张、棉絮等物，引起鼠疫；最严重的鼠疫发生于绥远地区，截至1942年1月最后一个星期共发生600余起鼠疫传染病。大量事实证明侵华日军在中国施行细菌战试验——在浙江和湖南日军飞机空掷物成功引发了鼠疫流行。文件最后对侵华日军非人道的细菌战进行了强烈谴责。^①

顾维钧档案中收录的这两份附件，第一份此前完全没有公开，第二份中有关1940年宁波鼠疫部分收录于黄可泰等主编的《宁波鼠疫史实——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证》一书，系日本东京大学政治史教授竹前荣治提供，黄可泰等节译了衢州部分第一句、宁波部分和终段，其中宁波部分如下：“1940年10月29日，在浙江省宁波发生腺鼠疫，持续了34天，99人死亡。1940年10月27日，日机向宁波飞来，在这个港口大街上散布了大量小麦，当时，因谁也不知日军的行动意图，因而未能对这种小麦进行彻底的调查，死亡者都是本地居民，这种疾病的诊断由实验室检查所确定。在这种传染病发生以前，鼠间没有引起大量的死亡。即使作了非常慎重的调查，也没有发现其他外来的传染源。”^②这两份附件对于揭发侵华日军生化战，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

顾维钧为这次会议上作了充分准备。他希望会议能够按照丘吉尔对德声明和罗斯福对日声明，发表一个谴责侵华日军生化战的公开声明。但丘吉尔的兴趣点不在此。顾维钧在电报中称“邱相谓我所举事实确凿，理由充分”，但是他不愿意发表公开宣言，“惟宣言一层，英方不无困难”。丘吉尔作了两点解释：第一，英国认为印度人口稠密，没有配备“防空面具”或“其他适当设备”，宣言一旦发表，将会引起“印民恐慌，无以应付”，因此“盼暂缓议决”；第二，英国认为美国总统罗斯福已经发表警告侵华日军勿施毒气战宣言，如果日军再“滥施毒气等不法战术”，英国“必与美一致，亦予以同样保护”，因此丘吉尔“请各代表先行研究，我方提案待日后续议”。^③丘吉尔的表态，令蒋介石在伦敦太平洋军事会议上提案公开发表制止日军勿施生化战的计划落空。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仍然只有罗斯福的对日声明，这对蒋介石来说，无疑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六、结论：棋赛中的一个走卒

1942年4月19日蒋介石致宋子文电文称“在联合参谋会议和战争物资供应等重大问题上，中国并没有受到与英国和俄国一样的平等对待，而仅仅被作一个受监护者”，中国“作一切准备以支持美国的政策，有时甚至不惜违背我们自己的判断”，“毫无保留地为联合国家的事业贡献了我们的一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和俄国人的态度。只要事关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从不会对共同的利益作出什么让步”，“如果将来英美联合参谋会议不予扩大以容纳中国，如果中国继续被拒于军火分配委员会之外，那么，中国则将仅仅是棋赛中的一个走卒而已”。^④处于“大国”外交迷幻中的蒋介石，对英美的任意一分有利于中国的表态，都抱有十分的幻想。罗斯福承诺为中国抗战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发表对日声明、提倡中国“四大国地位”，蒋介石报之以“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卑微姿态。丘吉尔发表对德声明只字不提中国令蒋介石26个小时难以释怀，缅甸战事抛弃中国军队也让蒋介石大骂英国背信弃义。但丘吉尔一提英国对华经济援助、一提英美将重返缅甸战场、一提英国提供印度作为援助中国交通通道，蒋介石马上发表英

① Annex II-Japanese Attempts at Bacteriological Warfare in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扫描件，“顾维钧档案”。

② 顾维钧：《关于日军使用毒气战和细菌战的控告书》，1942年7月3日，黄可泰、邱华士、夏素琴主编：《宁波鼠疫史实——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证》，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第115页。

③ 顾维钧致蒋介石电报，1942年7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扫描件，“顾维钧档案”，档案号：K00-0054-007a-0034。

④ 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2年4月19日，重庆。王建朗选编：《抗日战争时期中美军事关系资料》（续二），《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国之态度“自本月起亦完全改善，自认其过去之非礼矣”。^①这种“大国”外交迷幻，纵然可能获得某些成功，如罗斯福应约发表制止侵华日军细菌战声明。但正如王世杰指出的，“此种表示，系应我政府自请求而发”^②，并非美国“主动”而发，其效力、影响力无法与丘吉尔主动发表对德声明比较。更何况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中国政府的主动行为，只会如顾维钧在伦敦太平洋军事会议上敦促大会发表制止侵华日军细菌战声明一样，提案成功，讨论搁置，最后无疾而终。

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犹如棋赛中的一枚棋子，期待以“牺牲”“让步”换取盟国制裁侵华日军毒气战声明，成败由它不由己。反观中国共产党从 1938 年首先尝试向国际社会发出谴责侵华日军生化战通电，到 1942 年 6 月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关于控诉暴敌毒杀北坦同胞罪行通电、7 月《新华日报》发表中国人民控诉揭露日寇在华北施毒罪行的社论，再到 1944 年 7 月 22 日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发表痛斥日军使用毒气声明，中共清楚地认识到仅靠向国际社会揭露日军生化战罪行和呼吁国际爱好和平人士声援、支援中国抗战是不够的。中国抗战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途径，唯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抗战，与日军生死搏斗，“我们声明：在困难的环境中，不气馁，不妥协地既与日寇生死搏斗了五年，今后，我们将会像以前一样的与日寇搏斗下去，直战到最后胜利。”^③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麻风病隔离防疫史料整理与研究（1368—1978）”（20&ZD223）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周奇）

China's Status as a Major Power and Discourse Power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after the Breakout of the Pacific War

——Take China's Fight to Stop the Biochemical Warfare of the Japanese Troops as an Example

ZHOU Donghua

Abstract: After the breakout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Japanese troops flagrantly violated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and carried out biochemical warfare against Chinese soldiers and civilians. The CCP appealed in 1938 to condemn the crimes of Japanese troops.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Pacific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held Pacific Military Meetings in Washington and London to negotiate warfares in the Pacific. As one of the “Big Four” countries, China participated in the meetings. On May 10, 1942, Winston Churchill issued a statement to stop Germany from carrying out gas warfare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without mentioning China, which greatly provoked Jiang Jieshi who considered himself as one of the leaders of the “Big Four”. He committed Song Ziwen to appeal to Franklin D. Roosevelt to issue a similar statement. After Roosevelt issued a statement to Japan on June 5, 1942, Jiang Jieshi further sought to make Gu Weijun to issue a similar statement through the Pacific Military Meetings in London. On July 14, 1942, Gu Weijun made a successful proposal, but because Churchill put aside the discussion at the meeting, Jiang Jieshi's aim to make a public statement in London failed. In 1942, China's endeavor to condemn Japanese troops against their biochemical warfare in 1942 was only half-successful, highlighting China's status and power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China's series of statements to stop the biochemical warfare of the Japanese troops proved that the diplomatic efforts of weak countries, even though intertwined with the status of a mismatched “big power”, cannot gain the the right to speak on the world stage but only be a diplomatic delusion.

Key words: the KMD Government, CCP, Gas War Statement, Pacific Military Meetings, discourse power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① 蒋介石日记，1942 年 6 月 30 日。

②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1942 年 6 月 5 日，第 436 页。

③ 《中国人民的控诉：揭露日寇在华北施毒罪行》，《新华日报》1942 年 7 月 21 日，第 2 版。